十八大後中國政改將「積極」和「穩妥」尋找平衡點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屠海鳴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報告不僅在中國全國各地引起了強烈反響；在港澳台地區和世界多國也引發了諸多聯想和多向解讀。其中，政治體制改革備受關注。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報告中提及政改的大方向依然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總基調依然是：「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怎樣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改？胡錦濤講了七點。其中，國家機關在政改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他指出：「支持人大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依法行使立法權、監督、任免等職權」、「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這些闡述近日都不斷被港澳台和海外媒體所報道和評論。這也預示着，十八大後，中國的政改將在「積極」和「穩妥」之間找平衡點。

綜觀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共對戰略重心的把握經歷了幾個階段。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在引領十多億中國人迅速擺脫了貧窮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負面效應。之後，鄧小平提出了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力圖矯正過失。進入新世紀，中共將「兩個文明」的內涵進一步拓展為「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五年前的十七大上，中共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寫入了黨章。十八大報告又在「四個建設」之後加上了「生態文明建設」。至此，中共宣示：將「五位一體」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黨和國家戰略的新佈局。從這個認識過程可以看出，中共對發展的理解更加全面、系統，改革不再強調「單兵突進」， 而是更加注重科學性、系統性、平衡性，強調整體推進，那種「以某某為中心」的提法、「殺出一條血路」的做法都一去不返。而且，這樣的總體佈局，對應着全國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大權益，體現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又達到了新的水準。筆者認為，這也是「政改」前面一定要加上「穩妥」二字的深厚背景。

改革不再強調「單兵突進」

在今日之中國，政改已經到了不推進不行的地步。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中遭遇的幾乎所有深層次問題，最後，矛頭都指向政治體制。以經濟建設為例：十年來，中國保持了高速發展，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民眾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貪污腐敗蔓延、官商勾結現象依然十分嚴重。貪腐官員和不良商人的收入翻了十幾番、甚至幾十番。雖然社會各階層都從經濟建設中受益，但在不少地區、不少行業、不少領域，最大受益者並不是普通民眾。再以社會建設為例：十年來，中共免除了延續了兩千多年的農業稅，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覆蓋95%以上人口的社保體系，這確實讓老百姓得到了實惠，但媒體也經常曝光「開着平治吃低保」等不公平現象。由於缺少對權力的制約，惠民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經常「變形」、「走樣」。生態文明建設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依然直指政治體制。今年7月以來，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鎮海陸續發生民眾因擔心環境被破壞而反對工業項目上馬的群體事件。這些項目之所以引發群體性事件，還是政府的決策機制預判不夠、決策不嚴。政府關門決策，對民眾的訴求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民意在找不到出口的情況下集中爆發。民眾走上街頭集體抗議，引發了衝突。可以說，在「五個建設」中，「政治建設」已經成為「短板」。如果不推進政改，其他「四個建設」的成果要統統被吞噬掉，無論其他「四個建設」投入多大，都會被稀釋，老百姓最終不會滿意。這樣也是「政改」前面要加上「積極」兩字的背景。

那麼，究竟會是「積極」多一點，還是「穩妥」多一點？筆者認為，仍然要「摸着石頭過河」。

「政改」仍然要「摸着石頭過河」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在大刀闊斧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之後，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搞改革，「必須把握好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社會可承受程度」，這個「三度論」對於後來的改革產生了巨大影響。「治大國如烹小鮮」。由此，筆者認為，在中國這個社會矛盾比較複雜、傳統文化積澱比較深厚的大國推進政改，必須把握好兩個「度」。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對政治改革的承受程度」，一個是「民眾對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容忍程度」。一方面，如果政改推進得太快、太猛，既得利益集團能不能承受？如果他們合力阻止，不但會使改革流產，而且會使社會倒退。另一方面，如果政改止步不前，民眾會不會滿意？如果民眾的利益屢屢受到侵犯，超過了民眾的容忍度，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就會此起彼伏，局面就會很難駕馭。顯然，這是一個兩難選擇。由此，筆者判斷，十八大之後，中國的政改還是會在「積極」和「穩妥」尋找平衡點。從這一點來看，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的「生態文明」，不僅體現着自然界的淨化，更把中共反腐倡廉建設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和引導了最廣泛的正確方向。

一分為二看香港 莫說香港一團糟

孟樓

近年來，一直有人不斷唱衰香港，表達對香港管治狀況的質疑、不滿和批評，甚至將香港各方面的情況形容為一團糟或者一塌糊塗，但事實是否如此？劉兆佳教授在其新著《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認為，「雖然不少港人和內地同胞對特區的管治頗有微言，但外國人包括西方人卻一般認為特區管治情況其實不差。對外國人而言，香港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權保障、法治水平和廉潔政府各方面都令人艷羨。對那些在回歸前不看好香港前景甚至認為『香港已死』的外國人來說，香港在回歸後的情況，更是意料之外。隨着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前景更是一致看好。」

港競爭力 排名世界前列

劉教授此言非虛，回歸以來香港被外國人唱好的事實，在歷年世界權威機構發布的排名或者評比情況中可見一斑：

（1）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自1979年起每年發布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競爭力排名基於全球競爭力指數，由制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商品市場效率等12個類別的指標組成。香港的競爭力從2001年到2012年總體上升，僅2003年因「非典」而有所影響，去年是第11名，今年則是第9名，在亞洲超過日本而僅次於新加坡。

（2）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自1989年起發表《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Yearbook），主要針對全球60多個經濟體系，就其基礎建設、企業效率、經濟表現及政府效率進行評估，評比的項目逾300項。香港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在2005年以後一直穩居前三，去年與美國並列第一，今年獨佔鰲頭。

（3）世界銀行（World Bank）自1996年起每年公布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從話語權與問責、政局穩定與杜絕暴力、政府效率、監管質量、法治、腐敗控制等6個方面對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施政進行評分。香港多年來一直在政局穩定、政府效率、監管質量、法治及腐敗控制等指標上排名全球前十。

（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0年開始在《人類發展報告》中使用由「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成績指數」和「實際人均境內生產總值指數」三大指標複合而成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衡量各個國家人類發展水平。去年香港的HDI排名全球第13名，屬於高度發達地區，一直都被列入高度發達地區，而且排名呈上升的發展趨勢，基本高於韓國和新加坡。

此外，美國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自1995年起一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美國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加拿大費沙爾學會（Fraser Institute）自1996年起一直把香港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亦連續6年將香港評為「潛在競爭力排名」榜首。

中央支持特區 港人自強

由此可見，外國對香港回歸以來整體情況的評價其實並不差，甚至與不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相比較也並非處於劣勢。那麼，香港又是因何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獲得這些肯定的呢？

（1）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重視和支持。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力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戰勝「國際金融大鱷」，到2003年支持香港抗擊SARS疫情，再到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時力挺香港；從2003年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放自由行，到2005年「十一五」規劃綱要將香港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框架，再到2011年「十二五」規劃將港澳內容獨立成章；從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到全方位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從為香港提供水、食品、建築物料到清潔能源……中央政府回歸以來一以貫之地對香港的支持與關懷，可以說是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的源泉。

（2）特區政府的勵精圖治和廣大市民的自強不息。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公務員團隊與廣大市民一直共同努力，自強不息，在經濟上保持平穩發展，成功抵禦兩次金融危機的衝擊，繼續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在社會民生方面成功抗擊禽流感、SARS疫情，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質素和社會福利水平；在政治方面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堅持維護香港的自由、人權和法治……正是由於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共同拚搏，香港才會在政治穩定、行政效率、政府廉潔、法治水平、社會治安、公共服務、自由人權、營商環境等方面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3）建制派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有力支持。回歸以來，建制派以愛國愛港為己任，一直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香港繁榮穩定的中堅力量，堅持表達香港社會希望團結、繁榮、穩定的主流聲音，由於他們能夠兢兢業業地為香港社會、香港市民服務，能夠踏踏實實支持特區政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因而亦能夠在多次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獲得選民的認同，形成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的多數力量，進而順應社會的主流民意，與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一同齊心一意謀發展，在議會內外挫敗了反對派一次又一次「為反對而反對」、影響香港繁榮穩定的圖謀。

困難不少 卻非香港獨有

當然，事實上香港仍然面對不少困難，但是這些困難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亦非罕見。

在經濟上，香港試圖克服產業結構單一、培育新興經濟增長點的經濟轉型之路，一直艱難前行，歐美國家同樣也在金融海嘯的泥潭中從「去工業化」走到「再工業化」，改造傳統製造業，建立新興產業部門，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社會上，香港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其實也是各個國家和地區內部面臨的共同問題。

目前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現狀是各個國家內部正在「變尖」（不平等程度在加劇），而國與國之間則在「變平」（不平等程度在減少），無論是發達國家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地區，都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裡變得更加不平等。世界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rganis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2011年12月份發表的報告書指出，發達國家收入最高的10%人口與最低的10%人口的差距達到9比1，是歷史上最高紀錄。所以，美國總統奧巴馬推行醫改方案時面對的困難絕對不會比現時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時所面對的困難少，日本、韓國等國家政府首腦的民望也不會比特首的民望好看，法國、英國、德國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亦不會比特區政府的多……這些問題實際上是現代社會管理的複雜性和難度的體現，沒有必要將之誇大成為唱衰香港的種種理由。因而，只有在一分為二地看香港時，才會在聽到唱好時冷靜地思考問題與挑戰，也才會在聞得唱衰時自信地肯定現實與成績。

（《本文轉載自2012年11月10日《成報》》）

制訂人口政策 構建優質社會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專業建言

五十年後的香港會是怎樣的城市？是朝氣勃勃的國際大都會，還是暮氣沉沉的邊陲小城。國家已經為香港未來的發展，訂立了目標，如何達致這個目標，還看我們的本事。政府最近重組了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正是為此踏出了正確的一步，事實上，這個委員會將負責研究香港未來30年人口結構變化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並提出對應的方法。

■陳建強

香港在港英年代，一向予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感覺。回歸以來，由於種種問題出現，一直未有長遠的發展策略，當時，社會已經有聲音，香港要有長遠的發展方向，首先要有自己的人口政策。曾蔭權政府在2007年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當時的成員只有相關決策局及部門的官員，委員會的「功課」欠奉，在五年內僅研究兩個問題，一是研究為回內地養老的長者提供方便；二是研究雙非子女回港學習與生活所帶來的影響，委員會最後亦只是發表了一份報告，就草草了事。

減慢人口老化 促進經濟發展

事實上，人口政策問題十分複雜，政府需循人口數量、結構及素質、入境政策、人口分布、遷移、外地勞工、教育政策等多方面，去考慮和制定一套人口政策，以釐訂社會發展方向。本港目前應透過人口政策，達致減慢人口老化，以及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目標。

香港政府要順利施政，必須要有具體清晰的人口藍圖，否則，政府施政只能靠估，就像教育方面，一時大刀闊斧地殺校縮班，一時又要為部分地區學位嚴重不足而惆悵；房屋方面，政府無視整體需求持續增加的現實，未有積極拓展土地，造成申請公屋者大排長龍，私樓價格有升無跌；安老方面，明知人口老化嚴重，但安老宿位、醫療設施供不應求，甚至連骨灰龕位都嚴重短缺。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香港的自然生育率只有0.93%，低於日本和新加坡。假若現有政策不變，從2001年至2031年的三十年間，估計香港93%的人口增長，是外地來港定居的人士。當中，內地移民約佔新增人口的82%。這現象在其他國家及地區的人口發展中，極之罕見。政府必須研究對策，例如鼓勵生育，令到社會整體回復生機；或是要加快港人內地子女來港的速度，協助他們融入社會，紓緩人口老化問題。最近，新加坡政府就設定生育目標由現時1.2生育率推高至1.4至1.5水平，年底就會發表人口狀況白皮書。

適當輸入香港欠缺的專才

人口政策另一個「功能」，是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國家「十二五」規劃已定明香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國家將「繼續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物流、旅遊、專業服務、資訊以及其他高增值服務業，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支持香港發展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中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增強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

既有大方向，又如何制訂政策，以達致相關的目標。香港增加的人口，目前主要是每日150名內地赴香港的名額，其實，當中並沒有完全用盡所有名額，政府是否在家庭團聚的考慮以外，適當地輸入香港欠缺的專才，當然，香港的教育政策，亦要配合經濟發展的方向。

今次政府重組人口督導委員會，除了官方委員之外，還加入了十一名來自學術界、人力資源管理界、商界、社會服務界、醫護界、教育界的人士出任非官方委員，希望吸納各界的聲音與智慧。我們期望新政府認真檢討目前香港的人口結構，制訂適合香港發展的應對之策，這是撥亂反正的關鍵一步，亦是確保香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之計。

起動九龍東 先要改善行人設施

顏汶羽　民建聯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

九龍東是政府決定發展的第二個商業中心，以觀塘、牛頭角、九龍灣及啟德發展區為主；以活化工廠大廈，轉為商貿大廈為主，增加甲級寫字樓的供應為重。

這個「起動九龍東」計劃龐大，將為該區帶來很多的人流及車流，大大加重了九龍灣、牛頭角及觀塘的港鐵站及沿路巴士服務的需求。但不得不注意的是，現時觀塘及九龍灣工廠區是幾十年前的道路設計，根本沒有預期今天要去承受這麼龐大的人流。

若大家有留意的話，該區不論是行人道或車道均非常狹窄，再加上違泊上落貨情況嚴重，特別是巧明街、偉業街、開源道等一帶，更時常出現人車爭路的情況，險象環生。

有見及此，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正籌備一項針對九龍灣商貿區行人環境改善可行性研究，以制訂及改善該區的行人環境，方便市民由九龍灣港鐵站進出九龍灣商貿區，以至啟德發展區海濱地帶。

現時九龍灣商貿區一帶，不斷有新增商廈，人流量不斷增加。大部分上下班的市民均由九龍灣港鐵站A及B出口，穿過德福花園後，使用兩條行人天橋往返九龍灣商貿區。但往往在上下班的繁忙時間，九龍灣港鐵站一帶便出現人多擠塞的情況，迫得大家停下來，形成人龍處處。另外，亦有不少大型商廈提供往來九龍灣港鐵站的穿梭巴士方便在這些商廈工作的人士上下班，但亦形成排隊的人龍處處。

要發展九龍灣商貿區，發展其潛力，釋放其經濟動力，成為香港的第二個火車頭之前，必須處理好行人暢達的問題。在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呈交予觀塘區議會的文件顯示，政府會在可行性研究中研究發展行人網絡，特別是行人天橋及隧道。同時，亦會擴闊行人路，優化交通燈號等等。

雖然如此，但這個可行性研究需於2013年年初展開，至2014年年尾才完成。筆者在會上亦提問何時才能落成行人天橋等網絡。政府的答覆是第一組行人天橋的落成時間預期是2017至18年度，全部建議落實需待可行性研究完成後7至8年才能完成。

在現時已經水浸不通的九龍灣港鐵站一帶，還是多等6至7年，才能有紓緩的具體建設，這是在「起動九龍東」的同時難以想像的。